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主办

2021 年第 24 期 / 总第 38 期

本期聚焦

《日本时报》：拜登“民主峰会”：纸上谈兵还是有所作为？

Just Security 论坛：拜登总统的民主峰会应致力于何处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前美国财政部长称，削减美中关税会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

《法国世界报 - 外交》：华尔街不太可能与中国再续前缘

目录

主流媒体报道	1
(一) 《日本时报》：拜登“民主峰会”：纸上谈兵还是有所作为?	1
(二) Just Security 论坛：拜登总统的民主峰会应致力于何处?	5
(三)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前美国财政部长称，削减美中关税会缓解 美国的通货膨胀.....	11
(四) 《法国世界报 - 外交》：华尔街不太可能与中国再续前缘.....	13



主流媒体报道

（一）《日本时报》：拜登“民主峰会”：纸上谈兵还是有所作为？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 12 月 9 日至 10 日召开白宫所谓的“民主峰会”，或者换句话说，一场以民主为主旨的会议。据拜登政府的说法，这场为期两天的民主峰会将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邀请 100 多个国家参与，旨在让全球民主重获新生。2022 年将以线下会议的形式召开该峰会，由受邀的各国领导人亲自到场参加。拜登政府称，这次的峰会将“聚焦民主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机遇，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平台，以传达个人及集体承诺，宣布维护国内外民主和人权的改革和倡议”。据推测，峰会结束时，各国领导人可能会就其计划在国内外推行的改革发表声明，体现各国改革雄心。

毫无疑问，此次峰会的召开恰逢民主面临种种挑战之时。全球监测组织“自由之家”（本文作者是该组织几份东南亚报告的顾问）将今年关于全球自由状况的报告称为“被围困的民主”。该报告指出，全球平衡已向独裁主义倾斜，同时“自由之家”还记录了全球自由度连续 15 年的下降。甚至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几近绝迹的军事政变也在卷土重来，今年在缅甸、苏丹和几内亚等地都发生了军事政变。

但是此次“民主峰会”不太可能产生多少持久的影响。确切



来说，全球民主衰退这一问题酝酿了 15 年，其产生原因有很多，从公众不满于民主领导人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方式，到像中国、俄罗斯这样最强大的所谓专制国家力量不断增强。所以，期望这一为期两天的线上峰会就全球民主衰退取得重大进展是不合理的。剑桥大学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国际层面上，对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不满已经达到二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变化背后的支撑因素有很多。

这一为期两天的峰会不会一下扭转这些不满。在一些曾经看起来民主正在取得真正进展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和俄罗斯，朝专制滑坡的程度如此之大，即便是有转机，也很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扭转。而且，拜登政府在几个方面上也使其召开的峰会难有作为。这次峰会邀请了 100 多个国家，包括许多与民主定义相悖的国家，如巴基斯坦、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菲律宾及其他一些国家。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并未举行自由和公平竞争的选举，也不允许相当程度的公民自由。正如卡内基基金会的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所指出的，根据“自由之家”2021 年全球自由度报告的排名，超过 30% 的受邀国是没有自由或仅允许部分自由的国家。

邀请这么多国家参加峰会冲淡了峰会的重点和明确性，在某种程度上使会议失去道德高地。邀请如此众多的参与者有可能让一些压迫性国家的领导人扰乱正常的对话并削弱提议。事实上，当围坐在（线上）会议桌旁的领导人包括来自菲律宾（该国总统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镇压新闻界并视察大规模的法外处决）、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巴基斯坦（两国军队在幕后对广泛的国内问题进行大规模控制）的领导人时，是否真的有可能对民主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进行有效的讨论？“自由之家”指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公民无法自由行使基本的公民自由，并且腐败盛行。由于政府部队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人身安全十分脆弱。”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被广泛视作武装部队的头面人物。正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并不是民主人士，所以这些领导人不太可能支持峰会上发表的对其国家人权和民主捍卫者表示支持的声明。

此外，邀请这么多并非真正自由的国家参与，让人质疑为何这些国家会被邀请。在许多情况下，像邀请菲律宾和伊拉克参与峰会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出于战略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民主国家。毕竟，菲律宾是美国在世界最动荡地区之一的条约盟友，而伊拉克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伙伴。尽管拜登政府可能并不想要疏远其战略伙伴，但邀请这些国家参会让峰会看起来不只是关于民主。

更重要的是，虽然拜登政府承诺“民主峰会”将邀请来自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参与，但其参与者似乎更多地集中于外国领导人。然而，任何有活力的民主都需要一个强大、繁荣的公民社会的支撑，这样的公民社会包括记者、非政府组织、贸易协会和其他团体。



正如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在《外交政策》中指出的那样，峰会应广泛邀请民间社会活动家参与，包括来自民主国家的活动家和那些在专制国家内部争取民主的反对派领袖。事实上，峰会应该邀请那些来自因压迫性太强而未被邀请参与峰会的国家的民主活动家：像缅甸、泰国、柬埔寨、白俄罗斯及其他地方。这会让峰会更具包容性，而不再是仅有最高领导人参与的“清谈俱乐部”，让人更多地了解这些压迫性国家的民主倡导者。最终，峰会不得不直面最关键的问题。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召集这次峰会，但近年来，美国的民主形象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严重打击。（公平来说，拜登一再表示，其在任期间的部分工作是重振美国民主本身，而峰会的声明也提到了拜登总统重振美国民主的愿望。）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一项涵盖 17 个不同国家的民调显示，受访者中，平均有 17% 的人认为美国民主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好榜样。（在日本，平均有 14% 的人表示美国提供了一个值得效仿的好的民主榜样）。同时，约有 57% 的人表示，近年来，美国的民主没有成为一个好榜样。这项民意调查并不令人惊讶。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卫星和有线电视以及老式的新闻报纸关注美国。他们目睹了美国的总统选举以国会大厦的骚乱告终；目睹了美国政客利用改划选区和其他反民主的工具及方式来维持自身权力；还目睹了美国政客们争吵不休，以至于濒临使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境地，此举将严重冲击世界经济。

尽管拜登总统在民调中比他的前任得到更多来自全世界人民

的信任，但全球对美国民主的悲观看法将在整个峰会期间削弱美国总统及其政府。这将阻碍拜登总统在诸多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包括说服参会者发表一个真正、统一的声明，即具体说明他们计划如何扭转全球民主倒退的局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场“民主峰会”可能最终只是另一个“清谈俱乐部”。

作者：约书亚·科兰滋克，2021 年 11 月 28 日

翻译：张鑫姿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1/11/28/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bidens-democracy-summit/>)

（二）Just Security 论坛：拜登总统的民主峰会应致力于何处？

总统乔·拜登计划于 12 月 9 日至 10 日通过视频形式举办民主峰会。鉴于 2005 年以来全球民主的倒退，此次峰会提供了一个重大契机。眼下是时候让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国家通过重要国际方案来扭转民主倒退的趋势。

一战后，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起建立了国际联盟，但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入，并且在其他成员国看来，其涵盖范围太过狭窄。德国等许多国家后来虽然相继加入，但都早早退出国联。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但其范围却过于庞大，其中不乏一些能够有效妨碍民主化进程的所谓独裁国家，



尤其是苏联集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约国家和苏联集团在 1975 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竟然成为了最为成功的国际协议之一，不过原因却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对合法性的需要，当时在赫尔辛基召开的这场会议并非就此结束，而是美苏日后持续会晤的开端。很快到了 2000 年，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与波兰外交部长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共同成立了民主国家共同体，至今仍然存在，但已无法在遏制全球民主倒退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民主峰会首先应该事关民主本身，峰会参会国家经过了精挑细选。美国国务院新公布的受邀名单中有 110 个国家，而根据主要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目前只有 91 个民主国家受邀。所有的民主大国都受到了邀请。不足为奇的是，由于美国希望邀请到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因此可以说，它有点过于“热情”。美国邀请了三个被自由之家评定为不自由的国家：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

在欧洲，美国显然将匈牙利、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排除在外，而邀请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想必此举意在羞辱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前苏联国家当中，只有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以及亚美尼亚出现在公布的受邀名单内。美洲和东亚的受邀国家相对没有争议。此外，拟定的



邀请名单中只有 17 个非洲国家，占非洲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读起来就像是美国在非洲的盟友名单，而个别相对更加自由的非洲国家则被排除在外。比如，为何不邀请塞拉利昂、贝宁、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索呢？自由之家对这些国家的评分高出近一半非洲受邀国。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整体而言，受邀国家都经过了认真合理的筛选。

以往尝试

在以往推动民主方面的举措当中，与民主峰会如出一辙的当属民主国家共同体。民主国家共同体于 2000 年 6 月在华沙发起成立，当时的 106 个受邀国家与现在大体一致，不同的是，俄罗斯仍被看作潜在民主国家，一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也在邀请名单之列。这 106 个国家在会议上签署了《华沙宣言：共建民主国家共同体》，这是一份简要而全面的人权清单，列明了各种民主制度应当尊重的一系列人权。那么，最终为何会失败呢？首先，当时在华沙召开的这场会议属于外长级会议，而本次华盛顿民主峰会则是各国政府首脑级会议。民主国家共同体主要被认为是奥尔布赖特（Albright）和盖雷梅克（Geremek）两人的个人计划，但盖雷梅克在华沙会议结束三天后被罢免，而之后数月内，奥尔布赖特也在下届美国选举后离任。如今民主国家共同体依然存在，并在华沙设有常驻秘书处，但一直被视为奥尔布赖特和盖雷梅克这两位最初发起者的个人计划，而非政府间的真正计划，因此也就缺乏政治影响力和效力。



展望未来

民主峰会应当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确立一年一次或一年两次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间常规会议程序。美国应保有领导权，并且会议应在华盛顿召开，因为每当召集外国领导人时，他们确实会来华盛顿。另外，在华盛顿设立政府间合作秘书处，使美国政府完全参与其中。

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些不错的国际性人权宣言，因此多一个也没有多大意义。民主峰会需要具备更多效力，集中关注国际制度建设。当下存在许多国际组织，但明显缺少两大组织：国际民主建设组织与国际法治建设组织。民主峰会应该着手制定各自章程，努力推动这两大组织的成立。如今还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在民主建设或法治建设方面提供可靠意见的国际组织。并且，真正的改革人士往往执政时间较短，而从国际社会所获取的民主或法治意见却寥寥无几，因而改革也就无法成功。

当前在民主法治方面最具相关性的两大国际组织或许当属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源于赫尔辛基磋商进程，涵盖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前苏联国家）与欧洲理事会。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欧安组织）总部设在维也纳，拥有大量人员从事冲突解决与检查工作。尤其是，欧安组织设有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ODIHR），这是最为重要的选举监督机构，事实证明其具备令人折服的公正性。然而，俄罗斯这个成员国似乎存心要妨碍、破坏欧安组织，原因是俄政府反对自由选举。



欧安组织的存在至关重要，必须加以捍卫，不过其职权范围无法涉及民主建设方面。

欧洲理事会于 1949 年成立，总部位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拥有 47 个成员国，并且成员国都是欧洲国家。其中最具争议的成员国有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白俄罗斯一直都不允许加入。欧洲理事会保护并推动人权、民主以及法治这三大核心准则。虽然欧洲理事会名义上属于政府间组织，但主要还是以各国议员为主，受议会的有效管辖。欧洲理事会接连陷入贪腐丑闻，其绝对有效性也大打折扣。欧洲人权法院（ECHR）是欧洲理事会最为重要的机构，每年受理数千起案件，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只不过是最后的希望，因为无论在判决上还是执法方面它都不够强硬。欧洲理事会另一大重要机构为威尼斯委员会，主要负责评估各国宪法和法律，拥有较大的权力，但往往过于谨小慎微。欧洲理事会的存在至关重要，但是它的区域性和议会性质使其无法成为处理重大事务的最佳选择。

毋庸置疑，各种双边援助机构与民间组织团体则更不具代表性。

经济实例

经济领域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履行发展市场经济的职责。这三大组织拥有大量财力、人力资源，因此任何有意愿的政府都已成功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



与在制度建设方面提供咨询意见的各大联合国机构组织不同的是，国际民主建设组织与国际法治建设组织这两个新型政府间组织并不一定要具普遍性。正如许多其它国际组织一样，一旦允许来自中国、沙特或者俄罗斯的代表们破坏任何有利自由、民主、法治的论据时，这些国际组织就无法正常工作。相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新型组织的成员国必须赞成某些原则条款，同时也需要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样，这两个新型组织应当配备大量预算和高素质人员。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涉及人权民主的非政府组织都位于华盛顿，因此民主建设组织设在华盛顿也最为合适。至于法治建设组织，海牙这座城市则比较恰当。自从 1920 年国际常设法院在海牙成立以来，海牙已成为国际法之都，吸引了十多家国际法庭，国际常设法院后来被 1945 年的联合国国际法庭所取代。然而，法庭终究只是执法机构，不能进行法治建设。

民主峰会当然可以处理其它许多事情，但应集中关注以下三件大事：确立民主峰会常规会议程序、筹备创建国际民主建设组织和国际法治建设组织。下届民主峰会上（希望一年后举行）应成立以上两大组织。

作者：Anders Aslund，2021 年 11 月 24 日

翻译：李洁心

(<https://www.justsecurity.org/79334/what-should-be-the-aim-of-president-bidens-democracy-summit/>)



(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前美国财政部长称, 削减美中关税会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

前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Jacob Lew) 周二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 取消贸易战最严重时期对商品征收的关税将有助于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他在 CNBC 的《亚洲街标》节目中称, 但是目前“没有政治空间”允许这样做。卢表示, “我认为, 美中之间存在很深的分歧。我从不认为这应仅限于关于一方或另一方交换这种或那种货物的谈判。它应该是关于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于 2013 年至 2017 年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他继续说道, “我从一开始就认为, 征收关税是一种应对中国攻击美国消费者的无效方式。而现在, 通货膨胀已然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削减关税实际上会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中关系于 2018 年恶化, 当时特朗普政府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北京以类似的惩罚性措施进行报复, 双方因此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汇编的数据显示, 2021 年初, 经贸易加权之后, 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平均税率为 19.3%, 而中国对美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平均税率约为 20.7%。数据显示, 在贸易战发生之前, 2018 年初, 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平均税率为 3.1%, 而中国对美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平均税率为 8%。

在提到削减关税时, 卢表示, “我认为, 两国领导人必须在



各国创造政治空间，使这些问题成为可以让双方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的议题，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情况会变得更糟。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正在承担美中贸易战高潮时期征收的高额关税所带来的大部分成本负担。该评级机构表示，美国进口商承担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 20% 关税所带来的 90% 以上的额外成本。报告称，这意味着美国进口商为受 20% 关税税率影响的中国产品在价格上多支付约 18.5%，而中国出口商则为同一产品少收 1.5% 的价钱。由于能源价格飙升和持续的供应链危机导致货物短缺，今年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已经飙升。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追踪了从汽油和医疗保健到食品杂货和房租等一篮子产品的价格，10 月这一指数同比涨幅达 6.2%，为 30 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卢告诉 CNBC，有可能“我们目前看到的大部分通货膨胀会通过其自身方式得到缓解。”他表示，“我认为没有人在预测恶性通货膨胀。”“但我认为目前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态度有一点过度紧张。坦率地说，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反应非常强烈。”但卢警告称，政策制定者必须小心谨慎，确保用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不会使经济放缓，以至于抑制经济增长。

作者：WeiZhen Tan，2021 年 11 月 30 日

翻译：张鑫姿

(<https://www.cnbc.com/2021/11/30/removing-us-china-trade-tariffs-would-ease-inflation-jacob-lew.html>)



（四）《法国世界报 - 外交》：华尔街不太可能与中国再续前缘

在博鳌亚洲论坛（类似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主题发言中呼吁建立新国际秩序，拒绝“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他说：“我们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

歌颂全球自由市场已经成了中国的官方话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重组跨国供应链，限制中国获取敏感技术以及进入美国市场。面临这种情况，中国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和全球金融的捍卫者。

很多外资跨国企业有限的爱国主义和对中国市场的无限渴求，让中国对他们寄予厚望。中国也一直在降低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壁垒，同时授权给美国一些大集团全资运营或是控股所有的子公司，给予他们更多专业细分市场的经营许可（财富管理、支付、债券发行、保险、评级等）。

2020 年 6 月 14 日，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银行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向高盛、贝莱德、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美国运通、PayPal、万事达卡、标普全球和惠誉评级



等公司颁发牌照。2021 年 3 月 18 日,《中国日报》欣然报道:“华尔街还是选择了做它最擅长的事——追求利润”。《经济学人》2020 年 9 月 5 日分享的一份评估:“中国正在创造机会”,这些机会对那些即便有所预料的外国资本来讲,也是“出乎意料的……许多观察者还在关注中美脱钩。但对那些每天管理着全球市场的数万亿美元资金的人来说,当下形势简直更像是挂钩。”

《金融时报》2021 年 2 月 4 日评论:“一个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这两者一谈到赚钱的话题,气氛总是相向而行大于背道而驰。”

据官方估测,特朗普任期时流入中国的资本总计达到了 6200 亿美元之多,除此之外还得算上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一众中国企业。截至 2019 年底,美国投资人手里共持有至少 8130 亿美元的中企股票和债券,而 2016 年的规模才只有 3680 亿美元。2020 年,外国持有的股票和债券分别增长了 50% 和 28%,总额徘徊在 1.1 万亿美元左右。而这些数据还是低估了资金流入规模,因为许多中国股票发行公司都位于离岸避税天堂:“这些中国企业在开曼群岛经营着 73 家子公司(超过美国、英国和台湾之后的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

维护 “国家利益”

这是与 “战狼” 外交和坚定维护 “国家利益” 一同而来的结果。有如雅努斯 (Janus, 罗马神话中的保护神) 的两副面孔——一面全球主义、一面主权主义——其实多看两眼也会觉得没那么



自相矛盾。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崛起是通过可控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实现的，这种经济一体化不一定会产生结构性依附：不同于被束缚于独立发展中的南半球小国，与国际接轨增强了中国的实力。这并非新的现象。虽然 19 世纪以来，非西方社会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往往会导致被西方统治或被迫居于从属地位，但资本主义全球化也促进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新的集中。国际资本流动正是由此对英国殖民地（即美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美洲大陆经济一体化和东海岸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伦敦连同其他欧洲金融中心一起，为美国的对外贸易提供资金，还投资了土地、农业、畜牧业、州和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基础设施（公路、运河和铁路等）。

中国主导

从 1865 年美国内战结束到 1900 年间，英国在美国的投资平均占全球总投资的 22%。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写道，截至 1913 年，尽管保护了“新生产业”，美国还是一再出现了金融恐慌，地缘政治压力也不小，但这些产业“远远超过大英帝国所有海外投资的三分之一”。这些资金流动对资本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促进了“第一个跨区域运输系统的快速发展”和“美国西部及其融入国民经济……(尤其是)进入东海岸的工业经济。”

在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集中的自上而下推行的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同样得到了英美投资者的“关键援助”。赫伯特·



费斯写道：“日本需要资金来制造武器、发动战争，在有效的国家管理下统一铁路规划、培育重工业、夺取并发展朝鲜和满洲、用公共服务装备城市。为达成这些目标，日本向海外借款。在战前的几年里，日本约有一半的公债来自国外。日本获得了世界各地的技术知识和设备，但资本主要来自英国。可以说，是英国扶持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其中不仅是政治忠诚，更多的是其提供的资本。”

而中国的例子是通过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严格监管外资种类和数量、成立合资企业“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如此，国家完全掌控着资本流动，使之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在合资企业中，外国人通常持有少数股权。在核心工业领域，是政府向外国投资者发号施令，而非听任外资安排，同时推动华为等国家“领军企业”的崛起，使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管控开放以管控风险

投资体制自由化和国有资产公司化在 2000 年代没有走向失控：国家保留了“关键资产的所有权，强有力的任命权，以及中央党政机关的全面监督和规划。”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最近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其他数十家公司的金融服务活动予以监管就是如此。这些企业的扩张，在政府看来削弱了政府对消费金融和信贷的控制。

外国金融公司同样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经营，中国目前只给它们相对有限的市场准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风险可控。中国的



金融业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导。有限可控的开放（尤其是对美国投资银行的开放）带来了丰厚的潜在利益：允许引进一部分外企，让这些企业的专业知识促进以中国为核心的金融中心的发展，从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此外还巩固并扩大了一批在中国的经济成功中获得利益并具有影响力的私有部门。

中国政府正在以此动员与美国战略利益相悖的国际资本，用以抵消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世界主要金融参与者就像以前的跨国工业企业一样，正被纳入中国的国家建设行列。一些投资中国的公司有意入局，且看好中国的崛起。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联席董事长、热衷支持中国的雷·戴利奥(Ray Dalio)表示：“大国崛起有几个前提：充足的生产力、财务状况良好、收支盈余、增长快于负债，而这些只有其居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勤奋、行为文明才能实现。”

美国权力精英中的国家安全部门对“中华帝国”的崛起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尽管两国相互依存（贸易、金融和技术），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美两极却陷入了激烈而持久的战略竞争。北京总是声称“用政治力量改变经济法是不现实的”，但美国又重新回到国家的权力政治逻辑。美国战略利益与国际金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正逼迫美国放弃全球经济自由化并回归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而全球自由化曾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6 月 3 日，拜登政府宣布决定延长并扩大特朗普的 13959 号

行政命令，该命令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工复合体构成的威胁”，将与该军工复合体相关的中国人员和公司的经济往来定为犯罪。这一决定是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4 月 8 日宣布将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做出的，因其“从事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美国的弱点在哪里

行政部门还根据白宫 14017 号行政命令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供应链”的初步报告，评估表明当今美国在以下领域处于落后地位：“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如车用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物和先进的药物成分 (API)。建议逐步加强美国制造业生产关键产品的能力，招聘和培训工人在美国国内生产关键产品，加大研发投入、稳固供应链，同时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增强集体供应链的韧性。”

评估的下一部分介绍了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六个支柱性工业基础部门：“国防工业基地、公共卫生和生物预防工业基地、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业基地、能源部门工业基地、交通运输工业基地以及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的供应链。”

6 月 8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这是一项旨在保障美国供应链、应对中国政府主导的研发挑战的两党倡议，将在未来 5 年间向公共和私人高科技研发领域投入 2500 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与此同时，华尔街继续和中国保持暧昧：2018 年成立的、旨在深化两国关系



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 (the China-US Financial Roundtable) 正计划于今年秋季召开。

作者: Philip Golub, 2021 年 11 月 24 日

翻译: 张猛

(<https://mondediplo.com/2021/11/04china>)

主编：王颖 执行主编：海尔（Pelagia Karpathiotaki） 编辑：徐天鹏 版面：盛茜



2021 年第 24 期（总第 38 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
对外开放研究院

印制时间：2021 年 12 月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楼 602 室

网 址：<http://acoes.uibe.edu.cn>

电 话：010-64494662

邮 编：100029

声 明：

1. 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数据来自于公开资料，仅供内部参考，不代表本研究院立场。

2. 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引用及传播。

